



一九八四年夏天的秘密

王锐

1984年,我十岁,读小学三年级。学校建在大队正中间,既不在堤边,也不在沟边,而是在河沟靠外的地方围成的院子。我和队友的小伙伴们每天早上沿沟边村道步行,过一座石拱桥,学校便到了。

自小学一年级起,我就是一名较为用功的学生,时不时担任学习委员等职务。母亲尽管读书不多,但对我们姐弟要求很严,每次考试结束,总要追问分数,甚至还要确认老师用红笔批注在试卷上的分数才放心。

那学期末考试后不久,我们返校取回考试成绩,数学试卷“79”分的红色钢笔字格外刺眼。回家的路上,我走走停停,不停走走,心里很不踏实。我见那个79分的“7”字弯折处老师写得较为圆润,便用红笔偷偷改成“9”字。心想,99分的数学加上本就分数不低的语文,应该排在全班第一了,回去也好轻松面对母亲。

改完分数,时间还早,为了不让我母亲发现试卷改动的痕迹,我磨磨蹭蹭,走了沟边堤岸,走了堤岸上堤面,一公里多的路程,我一个人走了整整一个下午,傍晚时分才回到家里。那时电灯也少,厨房点着煤油灯,母亲正做晚饭。

“回来了?!”母亲问。

“嗯。”毕竟心虚,我不敢高声回答。

“分数呢?”平时母亲不说试卷,只说分数。

“在这里。”我抖抖索索从书包里掏出试卷,小心翼翼搁饭桌上。

“拿过来!”母亲见我慢慢吞吞的样子,估计我没考好不敢拿给她,抬高了音量。

我便从桌上递给她。

“95,99,考得蛮好呀!”母亲刚刚严厉的眉头舒展开来,“第一名?”

“第一名。”我举了举食指。

母亲看了一下分数便将试卷放下了,没有产生任何怀疑。

整个暑假,母亲都很高兴。母亲是一个内敛的人,她的喜悦总是藏在心里,一般不会和人分享。那时,对于小孩考试成绩的优劣,大家关注度也没有如今这样高,尤其在为吃饱饭奔忙的“双抢”季节里。暑假假期较长,平时写作业,帮着家里干些沅送茶水之类的农活,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,我也渐渐忘了上学期末考试成绩的烦恼。

一转眼,又到了九月份的开学季。开学典礼上,校长宣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消息:为了激励学生刻苦上进,学校决定举行一个游行仪式,让期末考试年第一名(乡镇)小学统一出题考试,数学试题增大了难度,因此同学们分数都不是很高,我的综合成绩排名全班第三,获得了参加表彰游行的资格。

为了不影影响正常开学和上课,学校此次行动迅速,上午开学典礼结束,下午紧锣密鼓开展表彰上门。游行队伍从学校出发,时而沿着沟边,时而转到堤边,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兴高采烈,社员们不约而同站在路旁用称赞的眼神看着渐渐渐远的队伍。游行队伍里的我却低着头,红着脸,心里默默祈祷,希望母亲这时在田地里忙碌。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,因为校长通过大队广播已经将游行活动进行了播放,消息已是人人皆知。

那次,与我同队、比我一个年组的李同学偏偏考了个第一名。我们队在大队的北方末端,游行活动接近尾声时,长长的队伍和着鼓点也就到了我们队里。经过家门时,我看见我家的大门敞开着,禾场打扫得干干净净,禾场上摆放着许多木椅和一张小桌,桌上摆满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瓜子花生饼干。我看见母亲换上了走亲戚时才偶尔穿上的新衣裳站在禾场中间,我知道她在用全部的热情做着迎接游行队伍来家的准备。

队伍经过我家门前禾场不作片刻停留,而是沿着连接沟边的小道径直往李同学家而去。当游行队伍与我家禾场擦肩而过时,我望见母亲那突然变得满是疑惑不解却又深深失望的迷茫眼神。她已经看到了我胸前的小红花,与李同学胸前的大红花相比,那朵红花小得可怜。

那天游行结束后回家,母亲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问这问那。从此,她仍一如既往地关心重视我的学习,但不再追问我试卷上的分数。

自那以后,我更加勤奋更加努力,成绩多次名列第一,一直持续到外出求学。

1984年的夏天,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秘密,一直潜藏在母亲和我心里并共同守护着,谁也不会主动去触碰它,说起它。



编者按

水满有时观下鹭,草深无处不鸣蛙。进入水草丰润的夏季,万物生机勃勃。清朗的夏夜,伴随大蒲扇的悠悠凉风,耳畔不仅只有蛙声虫鸣,当然还有好听的故事。

夏天的故事

(小小说专辑)

夏天的疼

唐波清

夏天,我挺疼。因为我只是一只旱鸭子。

在老家,对不会游泳的人叫旱鸭子。说实话,在乡下不会游泳的人寥寥无几。从小,我就是一只被玩伴们嘲笑的旱鸭子。即使到了现在,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时,居然还有大伯大婶们开玩笑地向我打招呼:咱们的旱鸭子回来喽。

每年的夏天,我和家里人情不自禁地会想起或者说起“旱鸭子”这个揪心的话题。

每年的夏天,我必须回趟老家。我携妻儿陪伴着父亲和母亲,在爷爷奶奶的坟头前,点燃几柱香火,逐个打躬作揖。然后,一家人还得看望我哥哥的坟头,这是我每次回老家的规定动作。

我的哥哥叫“平安”,父母亲替他取这个名字,可能就是企盼他一生平安的意思,可终归是事与愿违。四十年前,哥哥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。

哥哥比我大四岁。哥哥两三岁的时候,父亲就教他戏水游泳,哥哥到了七八岁,已经是村里娃娃中间的游泳高手。哥哥游泳的姿势潇洒,花样繁多。就说那蛙泳,哥哥游起来活像一只上蹦下跳的大青蛙,有节奏,有线条,有美感;就说那仰泳,哥哥整个身体仰卧在水中,仅仅露出个脑袋瓜,时而漂浮水面,格外轻松舒畅;就说那蝶泳,我每次站在河岸上看哥哥蝶泳,哥哥就如同变成了一只蝴蝶,展翅飞舞,来回自如;还有那扎猛子……

哥哥十岁那年,暑假的最后一天,他自豪地领着五六岁的我,悄悄跑到离家不远的条小河里,教我学游泳。哥哥有板有眼地说,要学玩水,不能猴急,先从狗刨学起。啥叫狗刨呢?就是游水的姿势要像狗一样,头一直露在水面上,手脚并用,使劲捣水。狗刨虽然速度慢些,水花大些,但是容易学会,这也是学会玩水的基本功。

哥哥向我伸出大拇指指,在教会方法以后,又示范好几遍,可我就是不敢下水。

哥哥见我胆怯的样儿,不容分说,一把抱起我就蹿入水中,嘴里还嘀咕着,真是胆小鬼,你当一只旱鸭子?

哥哥的双手托起我的肚子,我胡乱地扑打着,只见水花四溅。

哥哥自言自语,哎,就是这个样子,手和腿要同时用力,继续,继续,好……哥哥的话似乎是在鼓励我。

在河岸边的浅水里,如此折腾好一阵子,我好像对狗刨有了一点感觉。

惊讶地向我伸出大拇指指,不错,不错,我带你到水深的地方玩一玩。

哥哥托着我慢慢移向河中央,我心里越来越害怕,感觉河水越来越冰凉。猛然,哥哥放开原本托着我的双手,我不由自主地狗刨,似乎使尽了浑身力气。大事不妙,我呛了一口水,又呛了一口口水,心肺里似乎要爆炸,鼻孔里感觉流了血,我的身体快速下沉,水下漆黑一片,再也沒有一丝记忆……

不知道过了多久。醒来时,我已经躺在河岸边,两只小脚还泡在浅水里。

惊恐中,村里里的人都围了过来。有人抱起我,有人在我搜查哥哥。

母亲哀嚎地哭,死去活来,惊天动地。

村里人说,哥哥将我推上了岸,他却沉入了水中,他的身体漂到河下游。哥哥离开人世仅仅只有十岁。

从此,母亲就坚决不让我下水,遇到有水的地方必须绕路而过。

在我儿时的印象里,每到夏天,母亲便用那根从村小借来的白粉笔,在我肚脐眼上画一只旱鸭子。母亲不识字,只能画鸭子,母亲说画的是一只旱鸭子。

夏季的每天早上,母亲画完旱鸭子,千嘱咐万叮嘱:记住,绝对不能碰水,假如你下了水,这只旱鸭子就没了,天黑的时候,娘要检查这只旱鸭子。听见没?

我极不情愿地回着母亲,记住了。

从此,我就真的变成一只旱鸭子。儿时,同伴们在河里嬉戏,我只能低头看着肚脐眼上的旱鸭子。长大以后,肚脐眼上的旱鸭子没了,可我再也没学过游泳,也许是对母亲的教诲的一种敬畏,也许是对死去的哥哥的一种赎罪。

今年的夏天,我惯例回了老家。

我久久地呆立在哥哥的坟头前……夏天,我挺疼。

年迈的母亲拍拍我的肩膀,打断了我苦楚而又酸涩的回忆。

母亲望着我感慨地说,还是当一只旱鸭子好。我心疼地随了母亲一句话,我就是一只旱鸭子。

田小妮的夏天

伍中正

田小妮的男人是春天死的。

田小妮老是想男人临死前说的话。男人的话,田小妮记得很清楚,不会轻易忘记,也不轻易对人讲起。

刚到夏天,村里的媒婆一天之内就给田小妮介绍了四个对象。

田小妮记得媒婆介绍的第一个男人是个鼓师。鼓师的鼓打得很好,好到了可以进专业乐团的那种程度。旁人议论鼓师的运气不好。女人生孩子时,他还在乡村歌舞团打鼓。等自己打完鼓回家,才知道是邻居打电话给医院,让医院的救护车把女人接到医院的。医生们惋惜,送迟了,女人的命没有保住,孩子的命也没有保住。鼓师曾经有一段时间言语不清,很多人以为他疯了。后来,鼓师渐渐恢复神志,一门心思打鼓,鼓打得越来越好了。

田小妮还看过鼓师打过几次鼓。鼓师打鼓时,神情很专注。

跟了鼓师,比你先前的男人要强,说不定专业乐团往后会要他。媒婆说。

田小妮没有回答媒婆,只是摇了摇头。媒婆很灵泛,再不说鼓师。

田小妮觉得媒婆的脑子总是装着一些男人的信息。

在田小妮面前,媒婆跟她说起了第二个男人。第二个男人是木匠。木匠的木工活做得好,尤其是床打得好。木匠打的床有很多年轻人预订。很多年轻人的婚床都愿意买他的。木匠还在小镇上开了一家木工坊。木匠运气不好,找的女人跟人跑了。木匠觉得,不跟自己扎实生活的女人,找回来也没啥意思。

木匠的遭遇,就是媒婆不说,田小妮也明白。

木匠是不是可以考虑?媒婆问。田小妮没有直接回答,只是摇了摇头。媒婆很灵泛,再不说木匠。

田小妮一直觉得媒婆会跟她说起第三个,甚至第四个男人,反正媒婆的脑子有的是男人的信息。

鞋匠是媒婆给田小妮介绍的第三个男人。田小妮跟鞋匠在镇上见过很多次面。男人没走时,有两双男人穿破的鞋,就是田小妮拿到鞋匠摊位前让他补好的。鞋匠人好,肯帮忙。本来补好了两双鞋,鞋匠却只要一鞋的手工钱。对比鼓师,对比木匠,田小妮感觉到鞋匠有一种说得出的好。

田小妮还是没有直接回答媒婆,只是摇了摇头。

果真,媒婆的脑子里很快蹦出一个人来,那人是宋长安。宋长安一直收破烂。宋长安收破烂不起眼,收了二十多年,却做了一件很起眼的事,他边收破烂边收养了一个孤女。电视台、报社来记者采访报道他,他只是说了两句:一个收破烂的,没什么可采访的。简简单单地打发了记者,径直收他的破烂去了。

媒婆不说,田小妮还真忘了这个人。在媒婆面前,田小妮还是摇了摇头。

整个夏天,媒婆好像在那些男人面前放出了话。

先是鼓师来了。鼓师在田小妮面前很精神地打了一通鼓,然后很神气地告诉田小妮,秋天,他就要进城里的专业乐团了。沉浸在鼓声里的田小妮清醒过来,对鼓师说了一句,鼓师,你还是到城里去,跟城里的女人过日子!鼓师明白田小妮的意思,走了。

接着是木匠来了。木匠叫人抬来一张床。木匠对田小妮说,往后过日子,用得着床。

那张床,田小妮看过两遍后,对木匠说,做工真好,放到你的店子里,肯定卖个好价钱!木匠说,既然床抬来了就抬来了,没有抬回的道理。田小妮说,怎么抬来的,就怎么抬回去。木匠很明白田小妮的意思,走了。

鞋匠是挑着担子来的。他在田小妮的屋前摊开鞋机,就等田小妮出来。田小妮出来,鞋匠就说,看看有没有穿烂的鞋,你的,你男人的,都拿来补补。

现在没有鞋要补。田小妮很不好意思地说。鞋匠明白田小妮的意思,挑着担子走了。

宋长安来的时候,确实让田小妮吃惊不小。宋长安不是一个人来,是两个人来的,他的身后,是一个俊俏的女孩。

宋长安说,要安心跟我过日子,就过,我不亏你,也不亏我收养的女孩,就当是我们的闺女!

田小妮噙着泪水,不知说什么好。

很久了,田小妮说,宋长安,往后,就把我当你的女人看。

云淡风轻的秋天。田小妮、宋长安,还有那个收养的女孩,齐齐跪在田小妮男人的坟前。

田小妮哭着说:死鬼,我田小妮是按你当初说的,往后跟宋长安好,也跟他收养的女孩好。

钱包风波

王建国

在离公寓不远的那个警务亭子前走出出租车,小曼又走进了这座熟悉的城市。

这个夏天,趁着跳槽的空档期,小曼回老家与母亲小住了几日。临走时,母亲牵肠挂肚地帮她反复收拾行李,一直送到高铁站。直到小曼过闸机走向站台了,她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。母亲已经老了,就像那座从小生活的县城。

到公寓门口,小曼拉开手提袋找门禁卡。

小曼一惊,糟糕,钱包不见了!

小曼将行李箱寄存到门卫处,急忙往回走,脑子里快速回闪钱包的行迹:钱包平时放在手提袋里,昨天晚上母亲拿过钱包,说是塞了1000块零花钱进去。今天一大早起票时,从手提袋里拿钱包取了身份证,然后塞进了手提袋。出站后,拦了出租车,在出租车上从手提袋里掏出钱包将身份证放回去。最后一次拿钱包是在出租车上,最大的可能就是拿了钱包没有及时放回手提袋,而是顺手丢在了座椅上。因为有些晕车,小曼对那辆出租车没有一点印象,只是觉得那个司机长得有点像影星王力宏,惹得她多看了两眼。

小曼下意识地在下了车时的警务亭旁,眼睛在车流中逡巡着,希望有奇迹出现:那个长得像王力宏的司机把钱包送回来。

在迷茫忐忑中愣怔了十多分钟,一辆橙色的出租车嘎的一声停在了她旁边。小曼怎么也想不到,从驾驶室走出来的那人正是那个“王力宏”。小曼迫不及待地上前询问钱包的事,司机拿出一个粉红色的牛皮钱包晃了晃。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钱包,小曼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,下意识的伸手去接。司机却把手缩了回去,说:“不急,验明正身再说”。司机从钱包里抽出身份证,姓名,证件号码一一核对,核对无误后,才把钱包交还给小曼。

司机说:“里面的东西你仔细清点核对一下,看有没有差错?”

小曼接过钱包深深地鞠了个躬,一连声的道谢。司机憨厚地笑了笑,转身欲上车离开。小曼过意不去,这一折腾,耽误了人家做生意,翻开钱包准备拿点钱给司机做点补偿。

打开钱包,小曼愣住了,慌忙叫住司机,说:“您等等儿,好像不对。”

“美女,哪里不对?”司机有些不悦。

“钱,钱数不对”,小曼说。

“有多少钱不对?”司机急切地问。

“2000。”小曼伸出两根手指头。

司机有些激动,脸涨得通红,辩解道:“美女,话可不能乱说。从你下车后,这个钱包就躺在后座上没人动过。我发誓,我,我要是动过你的钱,立马被车撞死。”

小曼噗嗤一笑,忙解释说:“不是说您拿了钱,而是钱包里的钱多了。”

“怎么可能?美女,我靠拉生意养家糊口,没工夫跟您在这儿开玩笑。”司机拉开车门,准备离开。

小曼急了,大声说:“我没跟您开玩笑,钱包里的钱真的多出了2000块!”

司机又从车里钻出来,没好气地怼道:“简直是荒谬,我一开出租的,就算你长得像仙女,也不可能拿出2000血汗钱塞你钱包里吧?”

“可我钱包里明明只有1000块,现在却变成了3000块,这不明不白的钱我也不能要啊!”小曼也不示弱。

路人聚拢来,议论纷纷,都觉得这件事新鲜,见过因为少了钱扯皮的,没见过因为多了钱扯皮的。警务亭里一中年警察走了过来,问清事情缘由,也觉得这件事耐人寻味。

面对众人不解的眼光,小曼尴尬不已,好像自己扯了谎在无理取闹一样。

“王力宏”也被众人看得满脸通红,仿佛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,百口莫辩。

这时,小曼的电话救场似的响了起来,是母亲打过来的。小曼接通电话,正好需要母亲给自己证明自己一下钱包里的钱数,她按下扬声器,问道:“妈,您昨晚往我钱包里放了多少钱呀?”

母亲在那头说:“孩子,妈知道你在大城市打拼不容易,最近又失业了,租房,吃饭,找工作,都要钱。你性格要强,妈怕你不肯收,就往你钱包里多放了2000块。孩子,别苦了自己,该吃吃,该喝就喝,有困难,妈给你想办法。”

小曼觉得眼睛发酸,终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